

已知的忘難

難忘的知己

陳漢平

追憶徐柏園先生

徐柏園先生是我在大學裡的同學，是我多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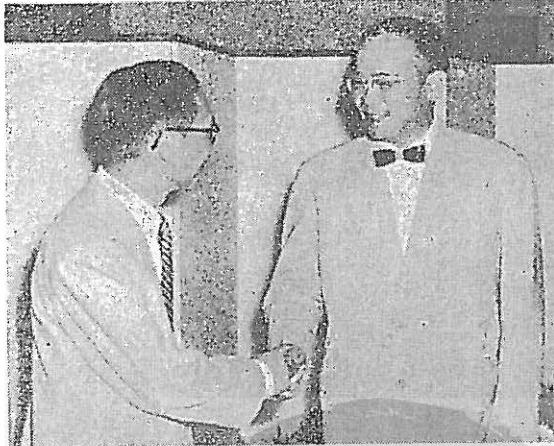
的長官，更是我的一位知己。

對於一個在傳統文化下生長的中國人來說，「知己」在他的感情上的份量是很重的，例如管仲曾說過：「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從這樣的對比便可想到。

我現在敍述我們遷來臺灣以後幾件小事。

民國三十八年多我來臺灣時，任職中央銀行秘書處副處長，住農安街武昌新村四號（與另一同事合住）。柏園先生是副總裁，住武昌新村六號，我們比鄰而居。在最初一年中，柏園先生會有二次叫我替他寫點文稿。記得第一次是有關當前財經問題的意見。當然意見是他自己的。我自覺拘束寫得不好，所以在第二次便表示我不適宜寫這類文件。表示這種態度原不算什麼重要，但是我當時的理由却嫌唐突：我說我不善寫別人意見的文章。我並且解釋說，我在大陸某處工作時，便有不替長官寫一般演講稿這類的約定。事後我自己想來真是越來越不好聽。但是柏園先生絲毫不以爲忤，他原諒我的直率。

徐柏園先生（右）早年與本文作者（左）合影。



民國三十九年春，鴻鈞先生由香港來臺灣回任中央銀行總裁。鴻鈞先生原也是我的舊長官

。但由於中央銀行從大陸的廣州遷往四川重慶折回臺灣的一段時間，我在秘書處工作中自覺與鴻鈞先生的二二親信要員有重大的不諧，我不願在新環境中發生不愉快，於是寫了一張辭呈送給舊任總裁，自己準備另覓工作。這又是我的一次不更世故的舉動。但是這張辭呈由舊任移交新任，給柏園先生看到。他雖不便直接退回給我，却勸我不可急躁；他更自動表示將替我去向鴻鈞先生說明。自然鴻鈞先生也是氣度寬宏的人，加上柏園先生的說明，便把我從秘書處副處長職務，改調為發行局副局長，免去我的一些無謂顧慮，也免去了我短期失業的痛苦。

民國四十一年底或四十二年初，柏園先生接長臺灣省財政廳兼「外貿小組」召集人。那時臺灣的生產事業仍是戰後凋敝的現象。物資缺乏，進口的需求甚大，而外匯管制嚴格，臺幣匯價偏高，商人祇要申請得外貿會許可，配予外匯進口貨物，便可大獲其利。當時負責審核這些申請進口案件的，是外貿小組之內新設的一個「普通輸入審核小組」——外貿小組每星期分配一定額的美匯給普通輸入小組，由後者分配給核准進口的



中央大學六十週年校慶徐柏園（前排右一）與本文作者陳漢平（前排左一）在慶祝會場留影，左二余紀忠董事長，右二為戴運軌院長。

這件工作我做得相當成功。我規定了申請進口案件的詳細審核程序，也設計了幾種表格要求各位審核人在有關的項目下面簽字負責。所以在這一段工作時期內，審核工作並沒有引起什麼閑話。我們曾得到柏園先生幾次親自招待聚餐，表示獎勵（因為常有超時工作）。小組的同人也都很高興。

也許是因為這點微勞，民國四十三年中臺灣省政府改組，柏園先生升任財政部長，他便力保我接任財政廳長職務。隨後外貿小組劃歸中央管轄，改組為外匯貿易管理委員會，仍由柏園先生主持；我却離開了小組工作。民國五十年我再由財政部出來任職中央信託局局長，在五十年代中，柏園先生還有一次要我兼任外貿會副主任委員名義參加外貿會內部工作。我因為當時柏園先生兼任中央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我久已是他的助手——兼任副主任委員——却因為時間限制，未真能替他分勞，中心頗有顧慮，便婉言辭謝了。

這件事我一直歉然在懷，因為他對我信任如此

案件——因此當時新設的普通輸入小組是一個責任很重，也可說是權力頗大而是非糾葛頗多的單位。一天，柏園先生把我找去，要我負責擔任這個小組的召集人。那時，我的名義上的職務已經

是財政部常務次長，不過臺灣的財政實權當時都在省政府，這是大家所熟知的。自然，我最初也謙遜了一番，也約略瞭解這將是一個是非閒話很多的工作。經過柏園先生強調了他對於我的信任之後，我也接受了下來。我的朋友中也有責怪我不應以常務次長「屈就」兼任這個小組召集人的。

我的說明：柏園先生自己原也是財政部政務次長，他何以「屈就」財政廳長兼外貿小組召集人呢？他是報答國家元首對他的付託，我是報答他對於我的信任。

這件工作我做得相當成功。我規定了申請進口案件的詳細審核程序，也設計了幾種表格要求各位審核人在有關的項目下面簽字負責。所以在這一段工作時期內，審核工作並沒有引起什麼閑話。我們曾得到柏園先生幾次親自招待聚餐，表示獎勵（因為常有超時工作）。小組的同人也都很高興。

也許是因為這點微勞，民國四十三年中臺灣省政府改組，柏園先生升任財政部長，他便力保我接任財政廳長職務。隨後外貿小組劃歸中央管轄，改組為外匯貿易管理委員會，仍由柏園先生主持；我却離開了小組工作。民國五十年我再由財政部出來任職中央信託局局長，在五十年代中，柏園先生還有一次要我兼任外貿會副主任委員名義參加外貿會內部工作。我因為當時柏園先生兼任中央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我久已是他的助手——兼任副主任委員——却因為時間限制，未真能替他分勞，中心頗有顧慮，便婉言辭謝了。

這兩個機構關係複雜，處事難免與他人乃至其他機構負責人的意見衝突，而我不是一個很圓滑的人，所以有時要鬧到高階層的會議中去列席說明。我自然也很珍重我的長官們給我的公平自衛的機會。記得其中有一次列席總統府財經會報，一次列席行政院會議，在我口頭說明之後。有一段休息時間，柏園先生都走過來和我拉拉手說：「你的說明很好。」或是「你說得很有理由。」雖然祇是這樣簡單的一句話，却給我很大的鼓勵。

我知道我的長官們是會主持公道的，所以我在任內處事也從不長縮。

我剛從公務退休下來時去看柏園先生，他那时也離開了公職在家養病，見面時，他問我「你能照拂自己嗎？」這又是何等誠摯而關切深厚的一句話！我真是感動到眼睛有點發潮。我說：「兒女都已長大，還可以生活下去。」近幾年他在家的養病生活十分安詳。我很慚愧很少去看他；固然由於醫師們的約束，也由於我有許多時間在國外探視兒女。

俗諺說：「人生得一知己可以無憾。」我有了賢如柏園先生這樣一位知己，顯然是很幸運的了！

訂閱中外雜誌請撥電話七〇七二四八〇

民國四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中日和約」在台北市簽字，右為日方代表河田烈，左為中國代表葉公超。

蔡以典「外交奇傑葉公超」插圖

(文見四十七頁)



(頁十四見文) 圖插「生先園柏徐懷追」平漢陳



前排，影留時多瓜厄問訪員官經財國我領半月六年四六九一(中)生先園柏徐
•生先鼎彝汪為一右生先華國俞載總行銀央中今為四左